

從躲空襲到避政治： 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吳新榮的圍棋戲*

陳文松**

摘 要

戰爭時期（1931-1945）的日本帝國，麻雀與圍棋等室內社交娛樂活動在「國策」下，命運截然不同。本文探討：一、「時局下」臺灣人日常生活中，與在臺日人相較，圍棋普及程度如何？二，臺灣人在此艱困的「時局下」，向在臺日人學下圍棋或愛好圍棋者不減反增，其動機又是為何？戰後初期政權轉換過程中，圍棋在臺灣人的日常生活中，又扮演著何種角色？1940-1948 年之間，圍棋這項「室內社交娛樂」是正值壯年的吳新榮最熱衷的活動，因此，從其個人圍棋經驗（日記）的剖析，有助於回答上述問題。

綜合本文研究：一、吳新榮從 1940 年學習下圍棋所欲了解的「人」，顯然直指地方「當局」的在臺日人。二、在二戰期間，燈火管制和躲空襲成為「忙中偷閒」下圍棋的最佳時機。尤其在妻子突然去世之後，圍棋成為吳新榮或獨處、或與摯友相處時的最佳排遣。三、為了逃避戰後的政治紛亂而深居簡出，與老友重聚下圍棋，成為邁入初老且罹患高血壓的吳新榮最大的享受。

關鍵詞：空襲、圍棋（碁）、吳新榮、燈火管制

* 圍棋又稱圍碁或碁，俗稱烏白、烏鶯戰。本文行文時原則上以現代通用之圍棋一語稱之，但為呈現時代特色、忠於史料文獻，或為圍棋專業用語，亦使用圍碁、碁，以及俗稱等。例如烏鶯戰、指導碁、碁客、碁友等。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來稿日期：2015 年 2 月 12 日；通過刊登：2015 年 11 月 9 日。

- 一、前言
 - 二、日治後期臺人圍棋的休閒化與職業化
 - 三、從打麻雀到下圍棋：時局的轉換
 - 四、從戰前躲空襲到戰後避政治：跨越政權下的圍棋活動
 - 五、結論
-

一、前言

根據日本圍棋史研究者增川宏一指出，日本的圍棋發展在「大正後半到昭和初期」受到普羅大眾的喜愛，可說是當時最受歡迎的「室內娛樂」之一（其餘名列前茅的室內娛樂則為將棋〔按：此指日本將棋〕和麻雀）。¹ 之後，隨著日本帝國入侵中國，掀起影響深遠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日本本土和所屬殖民地臺灣邁入總力戰的戰時體制。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圍棋並沒有像麻雀那樣，因被視為「不識時務」的「非國民」娛樂遭受法律壓制和道德批判，反而在戰時體制下，繼日本文學報國會、大日本言論報國會等之後，由日本棋院發起組織棋道報國會，正式編入大政翼贊會轄下之一環，而當時棋道報國會的會長不是別人，正是曾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改稱總務長官）的下村宏。² 被動員的日本棋院棋士包括瀨越憲作、木谷實等，更曾於 1940 年與吳泉（清源）受臺灣圍棋研究會同好與臺灣日日新報社邀請，連袂來臺「下指導碁」和「慰安圍棋」。³

¹ 增川宏一，《碁》（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87），頁 314。

² 增川宏一，《碁》，頁 316-319。

³ 七段・瀨越憲作評解，〈待望、吳七段出場，指導碁に對する豫備知識〉，《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1 月 14 日，第 8 版。本場「指導碁」由吳泉（清源）對戰梶原武雄三段，最後由吳清源獲勝。指導碁的對戰棋譜一共連載十五回（同年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8 日），參見《臺灣日日新報》該時期相關報導。至於有關瀨越憲作的生平事蹟，可參見李敬訓，《圍棋史話 1：從座子到御城碁》（臺北：鳴祝出版社，2011），頁 214-219。有關吳清源的記載相當多，可參見李敬訓，《圍棋史話 2：三三、星、天元》（臺北：鳴祝出版社，2011），第三章到第七章；李敬訓，《圍棋史話 3：昭和棋聖吳清源》（臺北：鳴祝出版社，2012）。所謂的「下指導碁」，要言之，乃高段棋士指導低段棋士之概稱。目的在

由此可知，戰爭時期（1931-1945）的日本帝國，麻雀與圍棋等室內娛樂活動在「國策」下，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⁴ 關此，筆者已針對麻雀在日治臺灣包括政策面、日常生活層面的演變和對應，發表相關論文。⁵ 而圍棋活動方面，筆者對於臺灣歷史上圍棋的流變，尤其有關「在臺日人」和臺灣人在日治時期的發展與相互關係，有初步的整理。⁶ 本文則是對「時局下」圍棋這項室內娛樂與個人層次的關聯性進行探討，主要的問題有二：一，「時局下」臺灣人的日常生活中，與在臺日人相較之下圍棋普及的情形，是呈現何等光景？二，何以臺人在此艱困的「時局下」，向在臺日人學下圍棋或愛好圍棋者不減反增，其動機為何？此外，戰後政權轉換的動亂局勢下，圍棋在臺灣人的日常生活中又扮演何種角色？

根據筆者對於吳新榮日記⁷ 有關室內娛樂的初步統計，1933-1948 年間可說是他「室內社交娛樂」——麻雀和圍棋活動最為集中的時期。⁸ 其中，1940-1948 年之間更是下圍棋的巔峰時期，因此，這段期間吳新榮個人的下圍棋經驗，無疑正是解答上述問題的重要史料。不過，為了避免流於「自說自話」，筆者同時亦

於誘導棋力較低者能突破瓶頸，以提昇棋力。而這類的指導碁，往往採一對一方式進行，故須額外付費招聘高段棋士，以示禮遇和酬謝。至於所謂「慰安圍棋」，乃指為因應戰爭動員，日本本土的為棋團體亦響應獻身報國的國策，因而派遣高段棋士前往前線或殖民地，以下圍棋的方式來慰勞傷兵和軍隊的活動。

⁴ 因為相較於麻雀在戰時被視為「非國民」的頹廢行為，圍棋反而是帝國政府與殖民統治當局積極動員和獎勵的娛樂活動。例如，1940 年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的機關誌《臺灣の專賣》，報導該局鹽腦課所舉辦的一場小型圍棋大會，標題不但徑以「戰記」名之，內文的敘述，更讓圍棋與時局的氛圍密不可分。一起頭便云「現在正是戰爭的時期」，接著十足肯定圍棋是戰爭下最佳的娛樂之道：「事實上圍棋是戰爭進行下最理想的趣味。第一可以提振精神，同時對於修養上、經濟上和社交上各方面，真是無話可說的娛樂之道。」參見青楠散人，〈鹽腦課圍碁大會戰記〉，《臺灣の專賣》19: 2（1940 年 2 月），頁 57。

⁵ 陳文松，〈日治臺灣麻雀的流行、「流毒」及其對應〉，《臺灣史研究》21: 1（2014 年 3 月），頁 45-93。

⁶ 陳文松，〈日治臺灣圍棋史初探：從東方孝義的觀察談起〉，收於林玉茹、植野弘子、陳恒安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V：社會與生活》（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6），頁 241-267。

⁷ 吳新榮日記，全 11 冊（1937-1967 年），2007-2008 年由張良澤總編撰、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吳新榮，字史民，號震瀛。1907 年出生於臺南將軍，1967 年病逝於臺北旅次。吳新榮哲嗣吳南圖於日記出版時指出吳新榮「歷經兩個政權體制下，『政治受難』的陰影就纏絆著他的大半生，三十多年來的『日記』乃是父親自省和舒壓的最佳工具，同時替我們留下可貴的歷史印記。」參見吳南圖，〈吳新榮日記全集〉出版後記〉，《臺灣文學評論》7: 4（2007 年 10 月），頁 92。

⁸ 吳新榮打麻雀的部分，筆者已有專文討論。請參見陳文松，〈日記所見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打麻雀」：以吳新榮等人的經驗為中心〉，《成大歷史學報》45（2013 年 12 月），頁 127-176。

針對《臺灣人士鑑》1934年版和1943年版⁹中明確將「圍碁」(或碁)當作「趣味」的人士一併列入討論,並參照1935年當時臺灣最高段位棋士田村達太郎五段所編輯出版的《臺灣碁客銘鑑》¹⁰和相關文獻史料,讓讀者能更貼近戰爭與戰亂時期臺灣人日常生活的面向、室內娛樂及「時局」之間的相互關聯和對話。

二、日治後期臺人圍棋的休閒化與職業化

(一) 日治時期臺人白領階層的圍棋活動

臺灣新民報社所出版的《臺灣人士鑑》(1934年版),首次將「趣味」(嗜好)列入調查項目,根據筆者統計在臺日人和臺人的知名人士中,有52位列有下圍棋(圍碁)的嗜好(反觀列麻雀為嗜好的只有10餘位,且無一在臺日人填寫此項嗜好)。某種程度上,可作為後人了解臺灣社會「上流階層」喜愛圍棋這項娛樂活動的參考。¹¹

首先,《臺灣人士鑑》中明確列出圍棋為其「興趣」的52人,臺人32位,在臺日人則有20位。從32位臺人碁客的學歷上來看,受過新式教育者便占了25位,且其中又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含改制後)、留學經歷者占絕大多數;其次從職業來看,醫師高居首位,包括著名社會運動家賴和在內。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生和留學生則不分軒輊,留學經歷者中亦不乏知名人士,包括林茂生和陳逸松兩人;書房漢學出身的傳統文人中,包括林幼春、林獻堂、林柏壽、許梅舫和廖學昆等人。換言之,若分析喜愛下圍棋人士的個別背景,與年齡無關,反而是與學歷高低或傳統文人素養成正比。¹²當然,這樣的局部統計並不能真實地反

⁹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

¹⁰ 田村達太郎編,《臺灣碁客銘鑑》(臺北:臺灣碁客銘鑑編輯會,1935)。

¹¹ 黃慧貞曾以《臺灣人士鑑》為對象,針對日治時期臺灣人上流階層的各项棋藝娛樂活動進行初步分析,文中並略微提及吳新榮、霧峰一新會及林獻堂、林幼春與圍棋活動的情節,以及日人比臺人更喜愛圍棋的現象。參見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頁175-178。該書雖已注意到日治時期臺人的棋藝嗜好,但與本文專門針對圍棋一項,以及殖民統治下臺人學習下圍棋動機之探究,並建構戰前與戰後圍棋活動的延續等分析,問題意識、史料運用與對圍棋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則有極大的差異。

¹² 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頁177。

映出實況，但仍可解讀出下圍棋的臺人，基本上是具備傳統文人素養，以及在日治後受高等教育的新式菁英間較為普及。其中特別引人關注的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及該校畢業的臺灣人醫師，喜愛下圍棋的比例相當高，例如前述的賴和與翁鐘五等人。從新近出土的老照片當中發現，圍棋是該校學生在宿舍時課餘的休閒活動（圖一）。戰前曾就讀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的府城（臺南）人蔡胡夢麟，便住過這棟宿舍，並有如下的細部描述，令後人可稍稍領略當時醫學生的日常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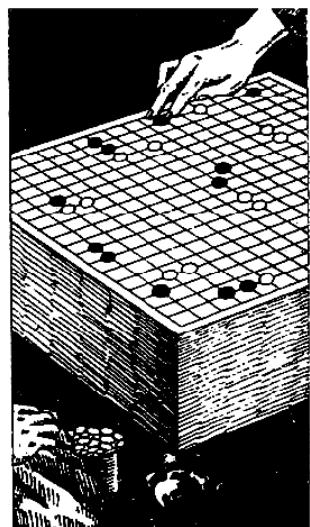
這是兩棟木造有長廊的二層樓房，樓上寢室，樓下自修室。在北棟西北方另有飯廳與洗臉兼洗衣室相連，伙食由學生選出炊事委員會擬定一週菜單，雇用四五名廚師和工人負責烹飪，以及浴室熱水與清潔的工作。學校當局派有舍監，那年是位教「修身」課程的小久江教授，他大部分教西洋哲學思想的課，下面還有位事務員甲斐先生，管理學寮雜務。¹³



圖一 醫學專門學校學生在宿舍下圍棋、看書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編目中），筆者翻拍。

¹³ 蔡胡夢麟（別號古月山人），《岳帝廟前：臺南鄉土回憶》（臺北：自費出版，1982），頁 213。



圍碁界の奇才

吳清源五段に

頭腦養生法を聴く



私はまだ若年のせむか頭痛とか眩暈とかにさほど悩まされ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が、對局して暫況が白熱して來ますと、非常に疲れをおぼえることが度々あります。甚だしい場合には精神が混亂して、此處ぞといふ大事な瀬戸際はどろろしても會心の一石が打ち込めない——音楽を響へて云へば落ちつきを失つて心境が亂れる。これが一番の打撃です。だから新聞で頭腦疲労の恢復に「はれやか」がよいと紹介されてゐるのを見た途端、一も二もなく試みる氣持になつたのであります。これを一服のんで對局すると、次第に氣持が澄んで冷靜に戦ひが進められます。そして相當長時間對局が延びても疲れる事が非常に少くなりました。斯んな良薬が發明されたのは只私達に限りない便利を興へて呉れるばかりでなく、日頃頭を使ふ頭腦労働者に取つて有意義な發明だと思ひます。

圖二 戰後臺灣圍棋發展的關鍵性人物吳清源，早在 1935 年即首度登上臺灣媒體的版面。

圖片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2 月 23 日，第 4 版。

值得注目的是，根據筆者統計，1943 年版《臺灣人士鑑》出版時，在「趣味」項中填寫「圍碁」（或碁）者高達 347 人，儘管自 1934 年出版《臺灣人士鑑》第一次統計以來這十年間收錄的「人士」總人數倍增，不過單以喜愛圍棋的人數計算，竟成長了將近 7 倍，由此可看出圍棋這項娛樂在臺灣社會已有相當大的進展。同時，下圍棋有益身心和腦力訓練的廣告或報導，也成為當時媒體宣傳的焦點（圖二）。

同時，更重要的是，若將 1935 年出版的《臺灣碁客銘鑑》與 1934 年版《臺灣人士鑑》52 位具有圍棋嗜好者名單相對照，尚可見到包括：林幼春（二級）、林茂生（七級，臺灣圍棋研究會）、林獻堂（四級）、林闊嘴（八級）、李幾法（十一級）、與儀喜助（四級）、日原清房（八級）、早川直義（和夫）（三級，臺灣圍棋研究會）、野口勇（九級）、長友綠（十級）、陳逸松（八級）、笹木長太郎（九級）、坂本素魯哉（七級）、吳宗敬（四級）、喜多兵太郎（三級）、貝山好美（十一級，臺灣棋院會長，臺灣圍棋研究會）、王錐（十級）及梅野清太（九級），共計 18 人因經過認證而擁有級數，而同時被收錄在《臺灣碁客銘鑑》中。若從職業來看，以銀行家、實業家、地方官僚及民意代表、醫師、教師和律師等，屬高收入、自由業的中產階級出身為主。其中圍棋團體方面，又以在臺日人貝山好

美為首的臺灣圍棋研究會最為突出，會員橫跨政商和種族，且陣容堅強，五段棋士田村達太郎為首的各地在臺日人段位棋士都名列其中，有田勉三郎初段擔任會長，這些段位棋士幾乎同時也是後來設立的臺灣棋院之顧問，至於該院會長一職則由上述臺灣正米市場常務理事貝山好美出任，臺人六級棋士陳振能也名列臺灣棋院評議員之一。¹⁴

至於臺灣人方面，則以大地主資本家、醫師、教師、律師及地方民意代表等為多數，可看出日治時期的圍棋活動已不再侷限於傳統文人，而成為不同專業人士的休閒娛樂。不過傳統文人的圍棋功力，卻不容低估，其中又以臺灣中部的霧峰林家最為突出。筆者在另一篇文稿中指出，霧峰林家雖非以職業棋士自居，林幼春和林獻堂卻都有近段的高級實力，且兩人對於推廣棋藝娛樂，可說既出錢又出力，躬身實踐。林幼春之子林培英更於 1930 年代中分別與訪臺的本因坊秀哉和臺灣人初棋士陳天賜下過指導碁。¹⁵ 而林幼春雖屬傳統文人，其圍棋造詣卻不容小覷。例如，1932 年霧峰一新會為推廣圍棋舉辦圍棋和象棋大會，其中，圍棋的第一等就由林幼春贏得。¹⁶

但同為傳統文人（吳萱草）之後，且同樣留學日本的地方知識菁英吳新榮，卻是直到日治後期才開始學習下圍棋，剛好跨越了臺灣人處境最為跳躍與艱困的政權轉換前後時期。他是基於何種心情與動機，突然開始想學下圍棋呢？

（二）日治臺灣的圍棋發展與臺灣人學習動機

東方孝義在 1942 年所出版的《臺灣習俗》中，對於臺灣社會圍棋活動的第一線觀察，能讓讀者有一概括性的了解：

圍棋在臺灣稱為文棋〔按：象棋為武棋〕，雖然這語彙存在當地，然而實際上等同不存在。這與對岸中國也不流行雖有關係，但我想最大的原因乃在於圍棋在輸贏之間要費上很長的時間，無法勝負立見才流行不起來不是嗎？雖然如此，自從日本統治臺灣以來，那些與日本內地人交往的臺灣人

¹⁴ 田村達太郎編，《臺灣碁客銘鑑》，頁 37。

¹⁵ 陳文松，〈日治臺灣圍棋史初探：從東方孝義的觀察談起〉，頁 256-257、260-262。

¹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183，1932 年 4 月 24 日。

之中，學會了下圍棋的技法，如今能體會下圍棋樂趣的人不僅增加了，同時也有不少人棋藝相當高深。¹⁷

而由此觀察出發，筆者曾在另一篇文稿中，檢視既有圍棋史相關研究成果，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圍棋發展「似是而非」的論述，並得出「臺灣近代圍棋發展在臺日人的推廣功不可沒、臺灣圍棋發展與「段級制」的確立、霧峰林家提倡傳統棋藝文化的重要性，以及臺灣人首位職業棋士陳天賜初段的登場」等結論。¹⁸ 相較於此，本節進一步關切的問題乃是：即使臺人下圍棋人口相對少數的情況下，其學習圍棋的動機為何？東方孝義所觀察到的面向是為了「與日本內地人交往」，這裡透露出圍棋在臺灣並非只是在臺日人由上而下的推廣所致，而是有一種「投統治者所好」的現實利益考量在內。

尤其從本文以下所舉吳新榮的事例來看，更有著經營政治關係、用來「知彼」——透過圍棋來了解「下圍棋者（尤其是統治者）」的所思所想，以謀取被統治者的最大利益。這與臺籍初段棋士陳天賜的「職業」取向——晉級升段、「以下（指導碁）碁為（=維）生」的路徑，明顯有著很大的差距。兩者之間，如陳天賜足以「下指導碁」的臺人畢竟是少之又少，更多的是像吳新榮這樣必須「與內地人交往」且多少有些現實利益考量的業餘人士。同時，臺灣社會中視麻雀為「沒有不賭」的，此與「圍棋在輸贏之間要費上很長的時間」的一般印象，也確實凸顯兩者間明顯差異的棋藝觀與不同的發展路徑。

而從《臺灣碁客銘鑑》所列臺灣人段位較高者，大多未被收錄於1934年編輯出版的《臺灣人士鑑》內，顯示出：一、「趣味」取向的《臺灣人士鑑》與「職業」取向的《臺灣碁客銘鑑》，原本定位就不相同。二、以社會地位階層高低為評選標準的《臺灣人士鑑》中的「上流階層」，與以圍棋段位高低為評選標準的《臺灣碁客銘鑑》之泛階層化，亦具有不同的社會屬性。換言之，後者所收錄之名單，是以圍棋專業取向，而未必是各地方的名望家，所以更為貼近普羅大眾。因此，任職於臺南州勸業課的初段陳天賜未能收入《臺灣人士鑑》，應可作此理解；反之，雖是地方名望家且級數甚高的臺灣人，亦未必會在《臺灣人士鑑》裡

¹⁷ 東方孝義，《臺灣習俗》（臺北：同人研究會，1942），頁364-365。

¹⁸ 陳文松，〈日治臺灣圍棋史初探：從東方孝義的觀察談起〉，頁263-264。

強調其圍棋段位的高低，也許與圍棋並非其唯一或最擅長、最感興趣的「趣味」有關。當然，若以其社會地位而言，更毋需以下圍棋為業。儘管如此，將兩者合併觀之，其實可以更貼近圍棋這項娛樂活動在臺灣人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且可以看出圍棋的「業餘」和「職業」特性已在 1930 年代出現分化。

進而言之，就《臺灣碁客銘鑑》所收級數屬五級以上的臺灣人「高級」棋士之地域分布而言，除上述臺中霧峰林家的林幼春、林獻堂之外，尚包括臺北出身的林熊祥（四級，臺灣棋院）、¹⁹ 林柏壽（四級）、²⁰ 王篆（四級），桃園的鄭永山（四級），臺中蔡家出身的蔡伯汾（二級）、蔡梅溪（三級），鹿港的施化古（四級），南投的吳宗敬（四級），²¹ 臺南出身的林金獅（二級）、劉茂雲（五級），²² 嘉義市徐杰夫（初段）、徐光汀（二級），高雄市出身的陳天賜（初段）、陳東（三級）、林龜吉（四級），屏東的林來癸（四級），和澎湖出身的王順良（四級）²³ 等，可說遍布臺灣西部各地與澎湖離島。顯然，東方孝義所稱「如今能體會下圍棋的樂趣的人不僅增加了，同時也有不少人棋藝相當高深」中的「如今」，絕非始於該書出版時的 1940 年代初期，而必須向上追溯至 1930 年代初期，並可將 1930 年陳天賜晉升初段視為重要指標。因為，陳天賜在晉升初段後便四處開帳授徒，遊走臺灣中南部各地「下指導碁」，走向職業棋士的道路，更代表臺灣圍棋發展已走出另一境界。有趣的是，如後所述 1940 年才開始學習下圍棋的吳新榮，在其初老之年的戰後 1948 年，也在摯友吳敏誠的私宅巧遇這位當時已晉升為三段、繼續在臺灣各地下指導碁的棋士陳天賜。

¹⁹ 田村達太郎編，《臺灣碁客銘鑑》，頁 36。

²⁰ 田村達太郎編，《臺灣碁客銘鑑》，頁 40。原文寫為林伯壽。

²¹ 以上人物的出處，請參見田村達太郎編，《臺灣碁客銘鑑》，頁 51、55、57、60-61。

²² 田村達太郎編，《臺灣碁客銘鑑》，頁 63。此兩位自 1929 年起，同時任職於臺南州內務部勸業課，劉茂雲為地方理事官兼任課長，參見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 5 年 8 月 1 日現在）》（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30），頁 446-447。〔按：當時《臺南新報》曾報導 1930 年高雄陳天賜升段時任職於臺南州勸業課。參見〈臺南圍碁大會〉，《臺南新報》，1930 年 6 月 19 日，第 2 版。若無誤，則臺南州勸業課可說是臺灣人圍碁高手薈萃之所，可惜卻無法從該職員錄中獲得證實。〕後筆者發現《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5 月間的一則短文，曾經對這位當時被譽為「天才棋手」的陳天賜有如下的報導：「前馬公街長的次男、並任職於臺南州勸業課的陳天賜」，經追查可推知曾任媽祖宮區長的陳柱卿乃為其父，而陳柱卿更是日治時期澎湖馬公的「屈指豪紳」。參見〈赤坎夜話〉，《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5 月 30 日，第 5 版；〈陳柱卿〉，收於蔣祖武監修，《澎湖縣誌·卷 14：人物志》（澎湖：澎湖縣文獻委員會，1972），頁 44。

²³ 以上人物的出處，請參見田村達太郎編，《臺灣碁客銘鑑》，頁 66、71、76、87。

(三) 吳新榮下圍棋的佳話與悲劇

除了戰後不久，巧遇當時臺灣本土段位最高的棋士陳天賜外，吳新榮在戰前曾有兩次圍棋悲、喜劇，只是鮮有人注目。首先是當時與其亦師亦友的楊雲萍，在1944年3月戰雲密布下，為了《民俗臺灣》取材而造訪佳里這位草地醫師。在送楊雲萍北返前，等車時兩人無意中對弈一場，應可列為臺灣文壇和碁壇的佳話。

昨夜與楊雲萍君談文說藝，不知不覺地一直談到深夜。暢談文藝、歷史、友情、家庭，深夜四點鐘聲響了，才就寢。今晨送些皇帝豆、香蕉做禮物，然後送他上車。等車之間下了一盤圍棋，結果我輸了。他說他的棋比詩更高上數段。然而晚上讀完那本《山河》詩集，他的詩畢竟還是現代臺灣一流的詩。²⁴

吳新榮與楊雲萍結識甚早，是在1928年吳氏考上東京醫學專門學校賃居沼袋時。吳新榮1925-1932年留日期間，雖大多在外賃居，但常常為了減輕房租負擔而與好友分租，因此結識不少日後共同奮鬥和相互切磋文藝、棋藝的摯友，與楊雲萍、蘇新等人的結交，便始於留學東京醫專、賃居東京時期。²⁵而在舊金川中學時期，吳新榮更曾數度造訪以自由主義學風知名的校長服部純雄之「自由學舍」，和戴明福、陳水土（逸松）等臺灣人學生一起讀書、聊天、看報等。²⁶

其次，1942年3月27日一場最日常性的對弈，則可說是吳新榮一生中最後悔的悲劇吧。在事情發生前兩天，吳新榮一如往常地下圍棋：

下午，教育係幾位人員，土岐視學²⁷之外，太田龍、²⁸水上明、²⁹黃庚寅

²⁴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7）：1943-1944》（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頁395-396，1944年3月24日。

²⁵ 「吳新榮在東京凡五年，曾六度搬家。初居戶塚，繼遷柏木，再移中野，吳新榮稱這階段為前期；其後又遷沼袋，荻窪，最後住在中延，吳氏稱這階段為後期。」參見施懿琳，《吳新榮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34-35。

²⁶ 施懿琳，《吳新榮傳》，頁17-22。

²⁷ 即土岐勝志，北門郡役所視學，日本大分縣出身。參見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17年11月1日現在）》（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43），頁629。

〔申〕三位和徐清吉、陳其和兩位來試戰圍棋，大家的工夫相差不大，都在十六、十七、十八級前後，真有趣。³⁰

這並非教育科人員首次來下圍棋，一個月前，太田龍、水上明也曾來找吳新榮下圍棋，吳晚上並和陳其和等友人繼續前往樂春樓二次會（續攤）。³¹ 但是3月27日當晚，不幸的事情卻意外發生了：

妻雪芬急逝。

昨晚，與陳其和君下圍棋時，從六甲來了電話，告知雪芬在九點多洗浴後，突然昏倒。情況危急，就趕快找輛計程車，十一點多到達六甲，一看，已是危篤狀態。一開始，她說上腹部很痛，昭川內兄給打了一針鎮痛劑。不久，貧血狀態並未好轉，把李源醫師接來，為她注射了五百CC的生理食鹽水之後，才恢復了意識。我為她打了強心劑數針，病況未見改善，而意識還算清楚。對我的問話，只說很痛苦。眼看著快撐不下去了，問她有沒有什麼事要交代，她只說沒有。在今晨零時十五分，三次緊緊握著我的手後遂告永眠。³²

雪芬毫無預警的急逝，不但讓吳新榮寫下千古文章〈亡妻記〉，也讓在生活上陷入悲傷情緒的他，不斷回絕友人各種撫慰的邀約，其中便包含下圍棋；³³ 一個多月後，吳新榮的生活才逐漸恢復常態，且由於此時父兼母職，雖然忙碌，不過圍棋和讀書這兩項休閒娛樂再度成為吳醫師「愁煞人」時最佳的心靈安慰劑：

²⁸ 太田龍，本名賴石成，北門郡教育科職員。1942年擔任吳新榮孩子們的家庭教師，1946年與吳新榮等人同為臺南市北門同鄉會發起人。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7）：1943-1944》，頁435。

²⁹ 水上明，北門郡教育科職員。為吳新榮戰後繼續來往之日本朋友。吳新榮逝世後，寄稿哀悼之。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6）：1942》（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頁217。

³⁰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6）：1942》，頁228-229，1942年3月25日。

³¹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6）：1942》，頁217，1942年2月23日。

³²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6）：1942》，頁229-230，1942年3月27日。

³³ 「雪啊！每天朋友一來，看到我陰霾的臉，都會說幾句安慰的話，或邀我上餐館，或下圍棋，我都拒絕了。」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6）：1942》，頁256，1942年4月22日。

漸漸進入吹秋風的季節，想起名句：

秋風秋雨愁煞人。

最近已達到如此心境：

書為妻、碁為友。

沒讀甚麼了不起的的書，但讀書是唯一的安慰；圍碁〔棋〕尚原地踏步於初步階段，不用外出求友，這就夠了。³⁴

顯然因為遭逢喪偶之痛後，圍棋在吳新榮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有著明顯的上升。「書為妻、碁為友」，不假外求，一個人就夠了！此時吳新榮的心境，可說悲到最高點。

以下，筆者將以吳新榮的日記為研究對象，解析其跨越戰前與戰後的圍棋活動，以其個人學習下圍棋的動機和展開為出發點，探究在不同時局和政權（即戰爭與戰亂）下，圍棋這項娛樂活動在臺灣人日常生活中較被學界所忽略的面向。

三、從打麻雀到下圍棋：時局的轉換

從吳新榮日記中所看到他的日常生活，其實相當戲劇性且具有深刻的時代感，且真實傳達出記主在不同時期生活中內心的心理轉折。麻雀如此，圍棋亦然。

論者常以吳新榮自稱「醫業是我正妻，文學是我情婦。」³⁵來探究其文學創作的投入與成就；而筆者在讀完吳新榮日記並以其日常生活的娛樂活動為研究對象時，卻往往不自禁地以現代社會的流行語「小三」來比附諷稱之。因為，這「小三」不但可影響本妻和情婦，而且往往還不只一個，時而麻雀居上風，時而圍棋當其道，有時更不惜出遠門，扮成「文化人」到府城去捻花惹草、看電影「透透氣」。³⁶

有趣的是，這些不同的「小三」在記主的日常生活經營過程當中，都有其「適時」、「適所」及「適人」的立意和權變。從麻雀到圍棋的轉折剛好處於吳新榮人

³⁴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6）：1942》，頁326，1942年8月30日。

³⁵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5）：1941》（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頁272，1941年10月23日。

³⁶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瑯琊山房隨筆》（臺北：遠景出版社，1981），頁92。

生最具活力的青壯年期，到逐漸邁入中晚年的階段；而時代更兼跨日治末期到戰後初期這段讓臺灣人從日常生活到國家認同，都面臨最為難熬且動輒得咎的艱困時期。所幸，今日我們得以從這套日記裡，直接閱讀和仔細吟味一個人面臨著瞬息萬變的時局變遷下，內心的轉折和甘苦之處。當然，不管是本妻、情婦，抑或是「眾小三」，都是記主生命中不可分割的存在；但為了讓記主生活及生命的詮釋更為多元、更能與不同時代相呼應，適當的裁切有其必要。日記雖有上述之重大意義，但記主吳新榮在寫作當下，未必有公諸於世的想法。所以，觀其所思所言，究竟是一時興起或有周密安排，以至是否言出必行，今日理解時應以同理心和長時期的觀察，始能設身處地於萬一。

首先，圍棋正巧是吳新榮在日治末期的 1940 年，年近壯年，之後卻接連遭逢健康走下坡、喪妻之痛及軍事動員高峰期此一內、外煎熬之際，取代投入糞坑的麻雀牌之替代性娛樂，並陪著他和伙伴們度過戰爭末期「躲空襲」的時光。

（一）從下五子棋到下圍棋

吳新榮下圍棋的因緣是何時種下，且又到了哪個級數呢？如上所述，他正式學下圍棋始於 1940 年。不過有趣的是，不論麻雀或圍棋，吳新榮都與其臺南高等商業學校時的啟蒙師林茂生，有著亦步亦趨的巧妙雷同。1936 年加入南洲俱樂部之後，吳新榮兩次在該俱樂部所舉辦的麻雀大會上，成為林茂生的手下敗將。後來，到 1940 年下半年才開始學下圍棋的吳新榮，經過兩年的不斷苦練後，雖可在伙伴中一較高下，但依舊不成氣候，1942 年的日記中，吳新榮甚至戲稱自己的圍棋才只「十六、十七、十八級前後」；反觀林茂生早在 1935 年已是七級的身段，兩者棋力相差真是須「以道里計」。不過由業餘棋手吳新榮的戲稱，亦可看出臺灣人的日常生活中，已經對圍棋的段位制相當熟悉和坦然。

撇開段位制不談，在喜歡上圍棋以前，吳新榮除了對麻雀相當沉迷之外，偶爾也會和伙伴們玩與圍棋類似的「五子棋」。³⁷ 例如在未正式向北門郡當地日人

³⁷ 「五子棋〔按：又名聯珠〕是一種兩人對弈的純策略型棋類遊戲，通常雙方分別使用黑、白兩色的棋子，下在棋盤直線與橫線的交叉點上，先形成 5 子連線者獲勝。」值得注意的是「在臺灣的流傳則是由日本人引進，1917 年 6 月在臺灣創刊《聯珠新報》，創刊編輯是聯珠新報社臺北支局的吉田野人。」詳細內容參見〈五子棋〉，維基百科，下載日期：2014 年 9 月 9 日，網址：<http://zh.wikipedia.org/zh-tw/五子棋>。

學下圍棋以前的 1938 年 11 月 22 日，適逢其三子吳南圖出生，吳新榮當天飯後便與友好下五子棋：

雪芬昨夜開始有了異狀，早上起床馬上打電話到六甲請岳母趕快來。到了下午開始初期陣痛，又趕快請產婆吳氏繡來。正好下午六點十分生下了個男嬰，我的第四個孩子，即第三個男孩。骨格和南星、南河同型。只有朱里畢竟是女孩，骨架與兄弟不同。以岳母和產婆為主，在晚餐時，安排了小宴。飯後到酒配銷所，和周約典、陳振鼓兩位玩五子棋，一勝一敗，連戰數十回合，沒有勝負。返家後開始想新生兒的命名問題，寫信告訴昭川義兄、奇珍兄和雪金報喜。³⁸

而吳新榮等人玩五子棋或日後下圍棋的地方，和打麻雀時一樣，主要是佳里街酒配銷所和自宅小雅園。

晚上到酒配銷所玩五子棋。對手是徐清吉、周約典兩位，他們都不是我的對手。黃大友君將在佳里開業當代書，我和徐君商談舉辦歡迎會，決定邀請的人有謝得宜、郭水潭、黃淵和其他幾位朋友。³⁹

昨夕開始舉行第二種防空演習，到金唐殿報到。和徐清吉君去拜訪石錫純氏，不在家。回程拜訪鄭國滇氏，看看他的新建築，並談些組合和街政的話。傍晚到佳里興外診，之後拜訪郭水潭君，談了些話。晚和黃大友君一起去找徐清吉兄，玩五子棋。⁴⁰

由此可知，吳新榮在學下圍棋以前，除了麻雀以外就是五子棋，而與打麻雀不同的是，對手和場所相當固定，即黃大友、徐清吉兩人，地點主要在酒配銷所，因為該配銷所是由方沁和其女婿徐清吉擔任酒類經銷商，所以幾乎成了「鹽分地

³⁸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2）：1938》（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頁 327，1938 年 11 月 22 日。

³⁹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3）：1939》（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頁 165，1939 年 1 月 6 日。同年 10 月又記載大勝徐清吉，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3）：1939》，頁 280，1939 年 10 月 19 日。

⁴⁰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3）：1939》，頁 279-280，1939 年 10 月 17 日。

帶集團」的附屬俱樂部。⁴¹

文中所稱防空演習，自然與戰時體制有關。為了提高國防意識，臺灣軍司令部早在 1931 年就特地選於「陸軍記念日」當天，以大臺北地區為主，進行了全臺首次防空演習暨燈火管制。⁴² 而當日本對中國發動滿洲事變，日本本土和殖民地臺灣進入戰時體制後，更是不時在全臺各地舉行各種規模和時間長短不一的防空演習暨夜間燈火管制，尤其 1937 年中日全面性開戰後更是如此，臺南地區也不例外。⁴³ 然而如上所述，即使在防空演習期間，由於並非真有敵機來襲，這段「躲空襲警報」的時間吳新榮仍經常和伙伴一起玩五子棋。

1940 年 3 月吳新榮將麻雀牌投入糞坑後不久，決定開始正式學下圍棋，而從日後的日記來看，圍棋幾乎完全取代麻雀的地位。因此，這一年可說是吳新榮的室內社交娛樂從後者過渡到前者的分水嶺。這樣的轉變除了是室內社交娛樂工具的轉變以外，更重要的是隨著兩者性質的不同，其目的和對象也出現極大的轉變。在殖民政策與時局上，麻雀既是賭具，打麻雀本身更被視為「非國民」的行為；反之，下圍棋則是符合戰時「國策」的正當娛樂。也許，這也是對時局異常敏感的吳新榮，之所以後來幾乎完全禁絕打麻雀、改下圍棋的最主要因素。

（二）學下圍棋的動機：「多了解一些下圍棋的人的想法」

1940 年 8 月 21 日這一天，吳新榮在日記裡這樣寫著：

昨晚，和徐清吉兩人去找河崎又一氏，請他教我們圍棋。於是今夜找來徐清吉君下下看，結果我大勝。這是下圍棋的開始，也是勝利的開始。到目前只會排五個子（筆者按：即五子棋），總自覺不如人。今後多少學一點，

⁴¹ 所謂「鹽分地帶」是指日治時期北門郡所管的行政區域，包括現今佳里、學甲等六個區，因該地帶大多濱海，土壤中含鹽成分濃，故稱之。而鹽分地帶在吳新榮、郭水潭等人的提倡下，成為臺灣新文學中具有特殊性的「鹽分地帶文學」，此處使用「鹽分地帶集團」一詞，蓋除了文學上的意義外，同時也是殖民統治下，吳新榮及其伙伴從事政治活動重要的「社交機關」。參見陳文松，〈日記所見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打麻雀」：以吳新榮等人的經驗為中心〉，頁 166-167。

⁴² 〈敵機襲來する時……十分間の燈火管制 臺北では最初の試みの陸軍記念日の防空演習〉，《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2 月 14 日，夕刊第 1 版。

⁴³ 根據吳新榮日記記載，臺南州燈火管制措施從 1937 年 6 月 23 日開始實施：「自今日全州施行燈火管制的演習。」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1933-1937》（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頁 321，1937 年 6 月 23 日。

多了解一些下圍棋的人的想法。⁴⁴

吳新榮下圍棋與打麻雀有著重要相似性：第一、緣起都與圍繞其身邊的日本人高等警察（特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吳新榮返臺創業、立足佳里開始瘋狂打麻雀時，是吉山新一（圖三）；而開始學下圍棋時，則又是向特務河崎又一所學。⁴⁵ 第二、不論麻雀還是圍棋，徐清吉始終是吳新榮的主要夥伴。但在真實的地方政治圈中，無疑的，徐清吉等既是「盟友」，也是吳新榮在地方政治版圖布局的「棋子」，徐清吉尤其是其中最受信賴的「碁友」（圖三）。第三、吳新榮在學習下圍棋之前，是先會玩五子棋，蓋因其規則簡單且棋具與圍棋無異之故。最後，吳新榮將麻雀視為肩負其「社交」生活的重要娛樂手段，圍棋則在此之上，多被賦予了探知「日本內地人碁客的心理」的另一種特殊社交任務。因為此時期的「碁友」，雖然依舊是以鹽分地帶的伙伴們為主，尤其是交友圈中的王烏砧、郭水潭、徐清吉、黃庚申、陳清和、黃朝篇（以上屬甲、鹽分地帶集團〔青年派〕），陳穿、謝得宜、黃大友、陳其和、郭秋煌（以上屬乙、里門會集團〔留學生集團〕）以及黃寄珍、黃錡、戴明福（以上屬丙、臺南商專集團）等，這也是麻雀黨的主要牌友。⁴⁶ 1940年以降，當吳新榮學下圍棋後，又多了一圈：即當地在臺日人集團，此集團在戰爭末期是其積極進行「圍棋社交」的主要對象。

昨晚，和黃大友君去拜訪甲本繁二郎老，協議防衛團組織一事……，回家後，河崎又一氏、陳其和君、⁴⁷ 徐清吉君等已在家中下圍棋，下了兩局後，把長期拖延下來應寫的信，一直寫到深夜兩點。⁴⁸

⁴⁴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4）：1940》（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頁254-255，1940年8月21日。

⁴⁵ 河崎又一的生平不詳，但從吳新榮日記中可知，他是當地的日本人特務，且與吳新榮交誼匪淺。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6）：1942》，頁11，1942年1月19日。

⁴⁶ 陳文松，〈日記所見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打麻雀」：以吳新榮等人的經驗為中心〉，頁151-153。

⁴⁷ 陳其和，臺南市七股區人，吳新榮摯友。曾任職佳里漁業組合、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臺灣分團北門郡支部（主任為吳新榮）七股庄小隊長、臺南縣參議會參議員、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北門區支會（主席委員為吳新榮）常務委員。對吳新榮而言，陳其和可說是僅次於徐清吉的「碁友」，且吳新榮對他也是讚譽有加。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3）：1939》，頁302，1939年12月9日。

⁴⁸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4）：1940》，頁266，1940年9月21日。

從 1940 年起，吳新榮在地方政治版圖上可說連戰皆捷，先後擔任各種組合的要職；在事（產）業經營上也屢有投資，包括與伙伴們合開或共同投資油肥（佳里油肥工業株式會社）、⁴⁹ 養兔（北門郡養兔組合）、⁵⁰ 魚塭養殖⁵¹ 等地方經濟特許事業；為了安定家族經濟，極力奔走替內弟國卿爭取明治糖廠蕭壠糖廠原料委員；⁵² 為了讓子女接受好的教育，包括進入小學校就讀等，以家長身分積極參與校務。至於因戰爭動員而被殖民政府要求擔任各種衛生防疫、國防教育和改姓名、國防獻金之類的皇民化運動等，更是欲拒還迎。



圖三 1933 年 12 月 24 日青風會成員於小雅園記念照

說明：後排左一為日高等刑事〔按：推測是吉山新一〕、左三徐清吉、左四鄭國津，前排右站立者吳萱草，坐者右一吳新榮、右三郭水潭、右四陳清汗。

圖片來源：吳南圖珍藏，筆者翻拍。

⁴⁹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5）：1941》，頁 200-201，1941 年 5 月 7 日。

⁵⁰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7）：1943-1944》，頁 184-185，1943 年 6 月 10 日。

⁵¹ 即將軍老家大道公塭。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7）：1943-1944》，頁 152，1943 年 2 月 27 日。

⁵²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5）：1941》，頁 156，1941 年 1 月 15 日。



圖四 現存戰前吳新榮所使用的碁盤檯

說明：碁盒和碁子為戰後購置，目前吳新榮哲嗣吳南河、吳南圖醫師仍在使用。
圖片來源：筆者攝於小雅園吳南圖醫師自宅前，2014年1月16日。

這些事情，於公於私，已非地域社會內部臺灣人之間的對抗、合作所能片面決定，手操生殺大權者，都是地方殖民統治者（日記中則皆以「當局」稱之）。這便是吳新榮企圖透過下圍棋來探知「日本內地人碁客的心理」之需求，同時也是東方孝義所稱為了與在臺日人來往而學習下圍棋的動機所在。其中最為關鍵性的人物，即上述的日人特務河崎又一。這點從1941年1月21日的日記可窺其梗概：

我雖非世居此街，但這十年毫無疑問地我是這裏的居民。既然是居民，我有必要獲得到下列三個職權：

自治團體……街協議會員

經濟團體……信用組合理事

職業團體……地方駐在公醫

由此職務之獲得，才能夠自覺到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也能夠顯現出大家對自己的支持度，也能夠使自己人生的行程更順利向前邁進。目前已擔任了街協議會員，此後的目標是州會議員。又，關於地方駐在公醫一職，目前現任公醫還在，擔任此職已是不可能了。而信用組合理事一職，現在正好有缺，但傾向於官派的可能，吾等應動員下列八人以應對之。然而，如果當局主張由內地的日本人擔任此職，那就絕對無望了。⁵³

⁵³ 八人為王烏碯、郭水潭、河崎又一、洪金湖、陳清汗、徐清吉、陳穿、陳其和。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5）：1941》，頁164-165，1941年1月21日。

從上文可知：第一，吳新榮的政治野心與欲望，在戰爭後期達到高峰；第二，在謀取這些不同社會地位的重要過程中，河崎又一不僅是唯一日人，且在各項職務、業務進行時，都有其介入穿梭的角色（之後由河尻關太郎接替，後述）；第三，「如果當局主張由內地的日本人擔任此職，那就絕對無望了。」換言之，吳新榮此時期的競爭對手或職務授予者，都來自於「當局」。這與青年時期要對付的「老派」、「信組派」等佳里地方勢力已是不同層次（臺灣人不同勢力間的實力對決），而是必須直接面對地方當局「交涉」以取得先機的「政治特許」層次了。所以，河崎又一會成為吳新榮學下圍棋的教師、「下指導碁」，有現實脈絡可循。

1941年1月22日，吳新榮為了出馬競選蕭壠信用組合理事一職，找了他的政治導師王烏砧商談。

王先生也很贊成我出來候選，並指示幾點活動的方法。到目前陳其和、陳穿兩君也極力勸我出馬，並願意全力協助，非常熱心。河崎又一氏也甚表贊成，並向商工主任仲田全力推薦，此事尚未和郭水潭、徐清吉兩人表明，不過，打造了如此的基礎，他們兩位也一定會為此盡力才對。最後手段則要說動現任的組合長鄭國濱氏，但我想還是得去煩請河崎又一氏幫忙，才是最為有效。⁵⁴

同年5月，日記中更直接透露出河崎又一的重要功能：「宴會後，大家討論起有關新公司組織的話題，正好河崎又一氏來，就可以了解當局的許可方針。」⁵⁵雖然學下圍棋一開始是基於想了解「下圍棋的人」的心理，但學會了以後，吳新榮也逐漸感受到圍棋的深奧和樂趣：

昨夜，河崎又一與陳其和兩位來訪，教我和徐清吉君下圍棋。我的能力比不上陳其和君的一半又一半，同樣的，陳其和君的能力比不上河崎又一君的一半。我覺得下圍棋並非容易速成，但卻是一種有趣的技藝。下到十二點結束後，我就接著看《全傳野口英世》。⁵⁶

⁵⁴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5）：1941》，頁167，1941年1月22日。

⁵⁵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5）：1941》，頁205，1941年5月24日。

⁵⁶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4）：1940》，頁261，1940年9月4日。

前晚，受河崎又一氏招待，到他家吃壽喜燒，同伴者是郭水潭、徐清吉君。昨晚在酒配銷所，向河崎氏請教圍棋，同行者是陳其和與徐清吉君兩位。⁵⁷

而從日記中可知，為了趕快提升自己的棋力，吳新榮還不惜遠途，到北門郡向其他在當地任職的在臺日人「高手」學棋：

中午和黃清澤、陳穿兩位在叔父的地方吃飯。之後到北門郡第二高手的山西巡查那邊，請他教我一些圍棋的要訣。入夜，已經累了，仍然去酒配銷所下圍棋。⁵⁸

原本只是為了想積極了解「日本內地人的想法」而學習下圍棋，後來則與伙伴們陷入樂此不疲的狀態。如同打麻雀和玩五子棋般，吳新榮下圍棋時對於勝負的追求，往往有著一股異於伙伴們的執著：

昨夜酒席散場後，回家和徐清吉君下圍棋，下到凌晨五點，不弄壞身體才怪，曾幾何時，竟沉溺在酒和圍棋之中了。⁵⁹

對於吳新榮這種不管做任何事都像拼命三郎的個性，徐清吉在其過世後的追悼文當中，仍有所指陳：

新榮兄熱誠正直，個性倔強。對於圍棋，與余俱有同好，棋藝亦不相上下，輸輸贏贏原本是平常之事，不過吳君如果連連輸局，就不肯罷休了，有時廢寢忘餐，挑燈夜戰，徹夜不眠在所不顧。⁶⁰

揆諸日記，吳新榮以下的這段紀錄，不但印證了徐清吉的上述說法，同時更可看出兩人的高誼：

⁵⁷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4）：1940》，頁305，1940年12月28日。

⁵⁸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4）：1940》，頁278，1940年10月23日。

⁵⁹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5）：1941》，頁166，1941年1月22日。

⁶⁰ 徐清吉，〈追懷知友〉，收於吳新榮著、黃勁連編訂，《吳新榮選集3：震瀛回憶錄》（臺南：臺南縣政府文化局，2001），頁292-293。

昨天開始因西伯利亞的高氣壓，吹著強勁的季節風，寒流襲來，正閒得發慌，徐清吉君說他那邊有「艾斯培羅」和魷魚，請我過去，當然也要下圍棋。結果一直下到凌晨四點半，才奪回勝利。⁶¹

之後，隨著吳新榮棋力的進展，其圍棋社交圈也從「碁友」最常聚會的「酒仲賣所」，很快地擴展到當地在臺日人的生活圈，而這些人往往都是北門郡「當局」中的高階成員。

趁著到北門順便去拜訪前一陣子從佳里轉職來的渡邊波男巡查部長，他很高興地拿出啤酒招待，下起圍棋，並讓我四子。初勝二敗，下玩〔筆者按：完〕棋就回佳里。⁶²

今晨回佳里，近午時分，渡邊北門監視醫部長來找我下圍棋。日暮時，浦田七股國民學校校長也來下圍棋，前者連勝四目，後者吃黑子連輸。⁶³

雖然屢戰屢敗，但吳新榮不改其樂。而所謂「讓子」就是「下指導碁」，對象則都是北門一帶的在臺日人。由此可知吳新榮學習下圍棋的老師不只一位，只要級數比他高的在臺日人都可，其中最重要也最密切者，就是河崎又一。

四、從戰前躲空襲到戰後避政治： 跨越政權下的圍棋活動

（一）空襲救護體制下違規事件的善後與圍棋人脈

戰時體制下對臺灣社會的衝擊，首先是人力的動員與整編，吳新榮及其伙伴也不例外，被編入北門郡佳里街的防衛團救護班。並且還肩負著燈火管制的監視工作。不過，1939年佳里街防衛團成立後，吳新榮及其伙伴對於燈火管制規定似

⁶¹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4）：1940》，頁300，1940年12月18日。

⁶²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5）：1941》，頁219，1941年6月23日。

⁶³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6）：1942》，頁202，1942年1月28日。

不在意，當然這種心態與戰火仍遠有關。1939年2月2日：「昨夜，舉行燈火管制演習，身為防衛團之一員，出動參與之後，到酒配銷所和陳培初、葉向榮、高石城三位打麻將。葉、高兩位打輸了，找來郭水潭、徐清吉兩位當陪賓，到西美樓喝酒。清酒三瓶，佳肴四道，主客盡歡」。⁶⁴

到了1942年因應戰局擴大，日本政府認為臺灣各地隨時都可能面臨美機無預警的空襲，為了讓民眾習慣「躲空襲」，因此防空演習暨燈火管制演練的頻率也隨之愈來愈高。此時，吳新榮的室內社交娛樂也已從麻雀換成了圍棋，不過已習慣了戰時體制的管制和模式，只要沒有出現敵機，防空警戒待命時就成為眾人「忙中偷閒」、假公濟私的最佳時機。然而俗諺云：夜路走多了，總會碰到鬼。

馬尼拉於四日被攻下來之後，防空警戒解除了。一入夜，警戒警報又來了，防衛團全員出動。翌五日仍然一樣，輪到我的防毒班當班，因此和副班長徐清吉君出巡，走到西美樓。承老闆的好意，端出酒來，就叫了兩道菜和兩個妓女到民生牙科的二樓喝了起來。喝著喝著，不知夜之漸深，忽然家中有兩個急患者，緊要關頭，醫生竟然行蹤不明，妻子就帶著藥局生到處找人，終於被找到了。兩人遊興正濃時，竟然出醜。這場香豔戲被抓，只好向妻約定，今後除了宴會之外，不再出入料理屋，事情就此結案。隔夜，也就是昨夜只好待在家中，恰好壽坤從臺南帶回一個新棋盤，就找徐清吉君來一場開盤典禮。但禍不單行，四十瓦的電燈燈光漏到屋外，統監部的軍人進來調查，已無心再下圍棋了。一整夜想如何善後，也許這一兩天會被郡方傳喚，叫我獻金百圓也說不定。但到現在並沒有任何動靜，也許閉一隻眼放你一馬也不一定。總之，新年以來，令人不快的事似有連續發生的狀態。

今天是父親的生日（舊曆），晚上準備了什錦燒，簡單地表達慶祝之意。順便也想解悶氣，補辦前天未完成的開盤式，招待陳其和君和徐清吉君參加。⁶⁵

⁶⁴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3）：1939》，頁186，1939年2月2日。

⁶⁵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6）：1942》，頁189-190，1942年1月7日。

違反燈火管制的事情，處罰情形不一，⁶⁶ 吳新榮的案例，透過河崎又一的打探，並現往北門郡兵事科道歉，最後竟然出乎意料，僅繳交國防獻金 30 圓便告收場。⁶⁷

換言之，進入太平洋戰爭的激戰時期，因美軍空襲行動，臺灣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各方面的全面管制。吳新榮因為下圍棋而違反燈火管制，最後以繳交「國防獻金」了事。其實，在時局下，他不僅曾為子女教育而主動捐款，亦曾為開創事業而主動捐所謂「國防獻金」。⁶⁸

不過在戰爭末期，老父和族人因將軍老家祖業大道公塭違反經濟統制的規定（涉及黑市交易事件）而可能面臨牢獄之災時，幸賴吳新榮出面斡旋，終於避過牢獄之災，卻必須繳交鉅額國防獻金才獲得當局的「寬大處理」。而這次居中斡旋的，則是吳新榮新結交的「碁友」經濟警察河尻關太郎。⁶⁹

大道公塭的開發始於 1942 年，吳新榮日記當中如此記載著：

「大道公塭」開拓。

下午趁往診之便，騎上新修好的機車到將軍溪岸大道公埔。父親和四、五個同志要共同開墾大道公塭，正在測量中。大道公埔是將軍部落的祭祀公有產業，以二十年契約承租，約有十甲。計劃將其中一半低窪地築成漁塭，資本約一萬圓，分為五股份持分，股東為：吳萱草、吳丙丁、吳淵泉、吳正、吳管。叔父的份是由吳和對叔所讓渡過來的。淵泉叔是從事土木承包成功的，是有力的成員。正叔是有事業熱心的漢子，靠得住的人。管叔從事漁塭實際經營，經驗豐富，此一事業前景看好，一定成功。⁷⁰

不料事隔不到半年的 1943 年 1 月，吳新榮之父吳萱草卻被查察經濟犯罪的經濟

⁶⁶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的報導，宜蘭地方也首次發生因違反燈火管制而處罰陳姓米粉業者 50 圓國防獻金的案例。參見〈燈火管制違反は罰金 般鑑遠からず陳に在り〉，《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2 月 15 日，第 3 版。不過，《臺灣新民報》記者吳萬成於 1937 年亦因酒後違反燈火管制，竟遭臺灣當局迫其去職的命運。參見陳文松，〈日治時期臺灣「雙語學歷菁英世代」及其政治實踐：以草屯洪姓一族為例〉，《臺灣史研究》18: 4 (2011 年 12 月)，頁 93-94。

⁶⁷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6）：1942》，頁 198，1942 年 1 月 21 日。

⁶⁸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5）：1941》，頁 282，1941 年 11 月 22 日。

⁶⁹ 「晚上，警察課的河尻氏和埤圳的栗林氏來下圍棋。」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7）：1943-1944》，頁 217，1943 年 10 月 20 日。

⁷⁰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6）：1942》，頁 337，1942 年 9 月 24 日。

科人員傳訊，⁷¹ 當時雖未釀成大問題，卻是一拖再拖，久久無法了結。原來在日益嚴厲的物資管制下，漁獲交易也被視為重大問題，到了隔年7月，吳新榮才驚覺事態嚴重，因為原本只是單純的養魚蝦，卻被黑市交易事件所牽連。其日記裡寫著：「大道公塢的家業因黑市交易事件被連累。無論是前輩或有經驗者，只要從事自己不喜愛的事情，都不會有好結果。我真不知該如何收拾這不好的結果。」⁷² 儘管大道公塢發生在將軍老家，吳新榮也未直接介入經營，但因其父和族人深陷其中，只好親自出面向當局斡旋：

昨晚，為油肥公司的事，拜訪御鹽直轄取締巡查，辦完事後同赴謝得宜君的招待。在那邊又見到了渡邊高等巡查部長，約定今天一起到大道公塢去玩。過午時刻，部長之外，高等特務也參加了，由父親接待。途中在漚汪也請叔父、和對叔參加。抓了一些魚，拿到將軍烹調，新鮮的魚，香醇的酒，主賓都滿腹而歸。⁷³

事隔兩個月，吳新榮再度邀請當地的在臺日人到魚塢釣蝦，並在回佳里途中送了5隻斑節蝦當伴手禮給五藤郡守，晚上出席奉公壯年團常會，支會長五藤郡守還特地強調「食物的確保與養兔的獎勵」，因此讓吳新榮感到「此乃關係到我的事業，令人信心大增」。⁷⁴ 經此不斷地斡旋，事件解決終於也出現曙光：

晚上，訪河尻經濟部長，對大道公塢違規問題，請他寬大處理，結果可能以國防獻金解決了事，我想這是託臺灣外海空戰⁷⁵之福吧。從河尻宅回來後，和徐清吉君下圍棋，開始時被讓兩子，但最後卻贏得賽局。⁷⁶

隔天，在魚塢違規已出現解決的曙光後，剛好遇上國定假日，吳新榮再度邀請河

⁷¹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7）：1943-1944》，頁131，1943年1月21日。

⁷²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7）：1943-1944》，頁421-422，1944年7月21日。

⁷³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7）：1943-1944》，頁424-425，1944年7月30日。

⁷⁴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7）：1943-1944》，頁435，1944年9月10日。

⁷⁵ 應你指1944年10月間於臺灣花東外海所發生的「臺灣空戰」，為太平洋戰爭最慘烈的一場空戰，日本航空兵力受創嚴重，從此奠定了美軍空中優勢。而且「配合臺灣空戰，美軍亦在10月12日到18日，對臺灣各重要城市實行空襲。」參見莊天賜撰文，《二次大戰下的臺北大空襲》（臺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07），頁33。

⁷⁶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7）：1943-1944》，頁454，1944年11月21日。

尻與好友兼事業伙伴徐清吉來下圍棋，「正好」堂叔、同時也是大道公塏股東的吳淵泉來訪，所以就一起午飯。⁷⁷ 1944年12月8日適逢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三週年，吳新榮近午時分親訪五藤郡守：

近午拜訪郡守辦公室，提出三千圓的國防獻金，因為是魚塏違規一事受到寬大處理之故。五藤郡守說從未收過這麼大金額，非常高興。⁷⁸

3,000圓是多大的金額？林獻堂曾在1942年以大東信託株式會社捐獻陸、海軍各3,000圓國防獻金。⁷⁹ 由此觀之，以大東信託之財力才各捐3,000圓，如今吳新榮將軍老家的大道公塏卻因此經濟違規事件就捐出了3,000圓，難怪郡守收到這筆意外之捐後，幾乎笑得合不攏嘴。值得注意的是，這還是受到「寬大處理」後的金額，顯見其違規之重大以及「當局」體諒吳新榮已因戰局所須出錢又出力而手下留情。大道公塏事件如此，兩年前吳新榮違反燈火管制事件的處理方式亦然。由此顯見，吳新榮能受到地方當局如此關照，自然與其和伙伴對於地方公共事務的參與、協助戰時體制的賣力付出，並且藉由「圍棋社交」所建立起的「交誼」有很大的關係。

早在1943年10月，吳新榮已與河尻關太郎建立起「碁友」的關係，而在事件爆發後，吳新榮積極透過河尻與上級疏通，並不時邀請在臺日人到大道公塏品嚐魚蝦，這可說是在物資管制食物配給下的另一種饗宴。事件解決後的1945年4月，河尻因故要離開佳里時，吳新榮還邀請徐清吉等友人替他開送別會。⁸⁰ 無獨有偶，1944年1月時吳新榮竟在府城巧遇河崎又一，在獲知他已收到徵召即將被

⁷⁷ 「今天是節日，覺得有點輕鬆氣氛。上午，河尻經濟主任代理和徐清吉油肥社長來下圍棋，一直過午，正好屏東的吳淵泉叔也來了，就一起吃午飯。」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7）：1943-1944》，頁455，1944年11月23日。

⁷⁸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7）：1943-1944》，頁459，1944年12月8日。

⁷⁹ 觀林獻堂的日記所記載，富甲一方且被視為臺灣人社會精神領袖的林獻堂，自1937年起便獻金「不斷」，有以個人身分捐款，亦有以事業單位捐出，金額不一。例如，1942年便曾以大東信託株式會社的名義，各捐3,000圓給陸海軍。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頁6，1942年1月6日。

⁸⁰ 「晚上和梅本芳敬氏、吳乃占氏、徐清吉氏一起到西美樓，為河尻關太郎氏開送別會。」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頁128，1945年4月26日。

派往海南島後，特地連同府城友人款待河崎並深談多時。⁸¹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宣告投降後不久，五藤郡守親自送了書畫給吳新榮，另一位與吳新榮也有交誼的島田刑事，則送了一副麻雀牌給他當紀念。⁸² 由此可見，透過文藝、棋藝的交流，於公，吳新榮與「當局」禮尚往來、各取所需；於私，其與當地在臺日人間情誼之深，不但打破殖民體制的藩籬且延續到戰後。

（二）戰後避政治與下圍棋

大戰結束後的近十年裡，吳新榮再度於時代巨變中飽嘗難以捉摸的政情洗禮與折騰，從熱心投入到真心換絕情，下圍棋已全然失去「社交」的動力，反而成為其與伙伴們晚年不問政事的避風港。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主權易主。吳新榮也和當時大多數臺灣人一樣，熱烈迎接臺灣回歸祖國，並曾一度與蘇新、郭水潭等伙伴計劃組織「里門青年同志會」，「要建設此地方的新文化，又為政治團體的外廓運動」；⁸³ 只是沒想到，他的熱情被新政權的貪污腐敗和獨裁專制所澆熄，接連受到政治黑牢，從此對政治冷漠以對。

而一向是草地醫師吳新榮「心靈的故鄉」的府城古都，由於在戰爭末期遭受戰火無情摧殘已彷彿「古戰場」，⁸⁴ 無法如往常前去透透氣，況且必須整頓家園和家業，因此一有空閒，吳新榮和伙伴們便以「讀書、圍碁過日」。

終日不出門，專心顧生意。但一日不上十名之患者，密醫之橫行所致的。自決不關俗事，心裡感覺十分的寬量，自然也有讀書的時間，也有圍碁的餘暇。自光復以來稀有的日子了。⁸⁵

暴風雖不大，豪雨而連續。自昨日以來，只是讀書、圍碁過日。讀書也無何書可讀，只是看報，靜觀美、蘇的關係，待望國、共談判而已。圍碁也

⁸¹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7）：1943-1944》，頁373-374，1944年1月13日。

⁸²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頁190，1945年9月10日。

⁸³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頁194，1945年9月16日。

⁸⁴ 「已經平和的日子到來，我何不出門見聞戰後的狀況？而且臺南自舊年來尚未去看那戰災的程度。（中略）先由大統街入城，始見爆跡之慘。而疎開者歸來之人已多。戰禍與民苦之情景現於眼前。至西門町一望本町方面，宛如古戰場。嗚呼，我所愛的古都，如此變貌了乎！」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頁177，1945年8月19日。

⁸⁵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頁257，1946年4月19日。

無何人可學，只是和賴石成、黃甲丙兩君爭取烏白而已。⁸⁶

「讀書也無書可讀」、「圍碁也無何人可學」，相較於日治時期不分日人或臺人四處求師學圍棋，且經常與日人「當局」切磋棋技的生活，呈現出強烈的對比。而隨著改朝換代後的解放感，以及對國民政府統治的失望，「麻雀黨」也再度復活，只是健康在家事、國事皆極度勞心勞力下，已逐漸不堪熬夜的負荷。⁸⁷

吳新榮雖有心與政治訣別，但當權者卻不放過他，屢次製造冤獄，讓他疲於奔命。⁸⁸ 儘管深居簡出而有更多與家族聚會的時間，但四奔離散的好友能相聚下圍棋的次數卻變少了，所以，千載難逢能與老友相聚下棋，卻成了吳新榮中晚年最為愉悅享受的悠閒時刻。尤其是至交徐清吉，即使改朝換代，依舊是其最佳的碁友。

早晨吳敏誠、賴石成、徐清吉、陳天賜〔按：非高雄棋士陳天賜〕諸君都來招要參加他們的園遊會。好了，本日和他們圍碁、打牌〔牌〕、豪飲盛餐也非不可。⁸⁹

近午麻豆郭再強君和他一友來訪，臺北郭水潭君也和兩友來會，故備辦酒菜於小雅園，同歡珍客。晚上麻豆楊振君和他一友來訪，郭水潭君以外，徐清吉、賴石成、吳敏誠諸君也來會，故設宴於瑯琅山房，共敘宿情。夜間他們睡眠後，和清吉君圍碁至雞啼，因為客多夜寒，缺綿被了。人情不可忘，交際是負擔。⁹⁰

⁸⁶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頁280，1946年6月24日。

⁸⁷ 「正是仲秋夜，可是無月而細雨。自今日起，起來看患者，但尚不敢出去往診。晚上，徐清吉君、賴石成君、高柳君三人來訪，即打麻雀三環，雖好成績而未免病後太疲勞了。本定今日要去臺南會諸友，因為病後不能，而且天氣也不好。正午，設宴祀由防空壕請起來的諸神位。」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頁194，1945年9月20日。

⁸⁸ 1954年吳新榮的日記缺。其長子吳南星也曾統計吳新榮一生中的冤獄：「父親在東京醫專求學時，因參加社會民主運動，被日本當局關了十九天，但在二二八恐怖時期，二次困園共坐了二二八天黑牢。」參見吳南星，〈父親的種種〉，《臺灣文學評論》7:4（2007年10月），頁17。吳南圖對於1954年吳新榮的李鹿案，曾有如下深刻的描述：「1954年10月9日，其時我讀高一，哥姐都在外地念書。毫無預警亦無說明緣由，我竟懵懂開門目送父親任由兩位情治人押解赴北，父親亦沒留下半句話，頭亦不回地像要赴義一般。我的孤援無助，強烈的震撼與驚嚇，叫我久久不能釋懷。四個多月後，父親雖然平安歸來，但是家人心靈再度的創傷，不知何年何日才能撫平？」參見吳南圖，〈緬懷小雅園〉，收於封德屏總策畫、施懿琳編選，《吳新榮（1907-1967）》（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4），頁109。

⁸⁹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9）：1948-1953》（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頁3，1948年1月1日。

⁹⁰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9）：1948-1953》，頁9，1948年1月15日。

但好友一走，吳新榮馬上又感到「窮極」「無聊」，即使「最好是和幾個碁友爭烏白，但結果也只得無眠及疲勞而已！」⁹¹ 所以，甚至興起師法陶淵明和寫「自傳」的念頭。⁹²

如上所述，1948年2月12日吳新榮在吳敏誠家中巧遇日治時期臺灣人首位職業棋士，而此時已晉升三段的高雄陳天賜；⁹³ 10月，吳新榮日記中最後一次提到圍棋，則是他生平第一次主辦並參加的地方性圍棋比賽，並且拿到第三名。⁹⁴

「人情不可忘，交際是負擔」，可以看出吳新榮從學會麻雀到開始學圍棋，總有濃厚的「交際」色彩，甚至發揮的淋漓盡致；然而當政治上利空出盡、迫害及身，從麻雀與圍棋中一起同甘共苦的「惡友」和「碁友」，卻能不計利害、出身相挺的「人情」則不能或忘。例如，1955年2月吳新榮因李鹿案⁹⁵ 被關了四個多月後，終於出獄，並恢復臺南縣文獻委員會之職，而4月初旅居臺北的吳敏誠、郭水潭特地南下相見，久別重逢，吳新榮在日記中寫著：

一昨日，敏誠君由臺北歸來，他在佳里已經沒有家，所以經過二點鐘後就再回去了。我留他在我家吃晚餐，叫他不要客氣，看我家為他家。昨日，水潭君也由臺北回來，因他家裡有不和事，所以他回佳里與以前，我對他說了很多話，而後他不得不回去了。如此出外去的舊友，成功的或失志的，回來都先來看我，我自己也感覺著同是歷盡滄桑的一群人。⁹⁶

⁹¹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9）：1948-1953》，頁17，1948年2月3日。

⁹²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9）：1948-1953》，頁19，1948年2月9日。

⁹³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9）：1948-1953》，頁19，1948年2月12日。

⁹⁴ 「昨日下午，假中山堂舉行圍碁大會，目的是為要獎勵民眾娛樂，提高高尚趣味。洪區長波浪臨席外，來會者十餘〔餘〕名，各人都踴躍比賽，結果優勝者一等林自利，二等黃甲丙，三等本人。」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9）：1948-1953》，頁54，1948年10月7日。

⁹⁵ 李鹿（1911-1996），字石盤，臺南縣學甲鎮人。早年追隨林銳（吳新榮妹婿林永睦醫師之父）從事農民運動，參加「農民組合」。1931年與謝彰洲於北門郡學甲庄組織一班8人的「赤色救援會」，並捐款給該會而繫獄四年。戰後二二八事件後，曾參與由李榮凱指揮的北門郡地下組織，因而逃亡7年。李鹿逃亡期間，1952年於番子田與吳新榮相遇，吳勸李趕緊逃亡。1953年李自首，1954年10月9日，吳因受李鹿案牽連而入獄。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頁183，注釋251。

⁹⁶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0）：1955-1961》（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頁25，1955年4月5日。

戰後吳新榮在回憶錄中，以第三人稱如此平淡地描述「夢鶴」對於下圍棋的看法：

這是自廢止打麻雀以來的唯一娛樂。他雖未達到「名人」的地步，但他喜歡這樣「烏鷺戰」確可為文人的消遣方式，又喜歡這樣「方圓陣」確可為戰時的技藝修養。⁹⁷

吳新榮過世之後，臺灣文學史研究者施懿琳也曾在撰寫《吳新榮傳》期間，訪問了其哲嗣吳南圖醫師，並提到前文所述那張碁盤檯。

據吳新榮哲嗣吳南圖的回憶，吳新榮有兩個用檜木做成的棋盤，質地相當好，樣式也很古雅；石造的棋子，磨得非常圓潤細緻，令孩提時刻的吳南圖印象極深刻。從下棋可充分看出每個人不同的性格，在吳新榮的友人中，鄭國湏下棋時猶豫不決，躊躇再三；而徐清吉則下的是「快棋」，下棋子時不拖泥帶水，非常俐落。⁹⁸

而吳南河醫師和吳南圖醫師也曾向筆者口述，戰前吳新榮看診時也常常在診療室，一邊和友人擺譜下圍棋，只有當患者進入診療時才放下棋子，讓一旁友人等候；診療完後則繼續下棋。因此，經常讓一旁苦候的友人哭笑不得。〈緬懷小雅園〉一文中，吳南圖再次回憶起孩提時代父親與友人下圍棋的模樣：

打從日治時期至戰後參與文獻工作之前，平日工作之餘，父親常下圍棋。這是他拒絕繼續與損友喝酒、打麻將之後最快樂的休閒活動，他準備了兩組厚達六吋的檜木棋盤與光亮的黑白磨石碁子，在「瑠琅山房」或「小雅園」的樹蔭下與老友、或讓友朋之間，既愛又恨地捉對廝殺了起來。我們兄弟因此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之下，亦愛上這種磨練心智的遊戲。⁹⁹

⁹⁷ 吳新榮，《震瀛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頁 148。

⁹⁸ 施懿琳，《吳新榮傳》，頁 108-109。

⁹⁹ 吳南圖，〈緬懷小雅園〉，頁 108-109。

五、結論

綜合以上所述，吳新榮一開始學習下圍棋的目的就是抱著想多了解一點「下圍棋的人的想法」。其實，在打麻雀的過程中，他可說已經將包括鄭國滇、徐清吉等在內的鹽分地帶夥伴之性格，看得一清二楚。¹⁰⁰ 當戰時生活更為緊迫的情況下，吳新榮棄麻雀改下圍棋，並積極向北門地區的在臺日人「請益（下指導碁）」，從中可探知其從學習下圍棋所欲了解的「人」，顯然直指地方「當局」的在臺日人。主要原因在於殖民統治末期，吳新榮為照顧其子女教育、家族產業，甚至個人投資，以及追求地方政治上各種社會地位等公、私領域的提升與「野望」，在在都須要與「當局」交涉，且所有的生殺大權都掌握在「當局」手中。因此，透過在臺日人「官民統治階層」所通行的娛樂——圍棋，了解「當局」的想法。

自 1940 年將麻雀投入糞坑後，下圍棋頓時成為吳新榮及伙伴們可以堂而皇之的社交娛樂，讓戰時體制種種嚴厲管制和精神緊繃下的心靈有所抒發和寄託（「戰時的技藝修養」）。燈火管制和躲空襲（沒有敵機來襲）甚至成為「忙中偷閒」，下圍棋的最佳時機。尤其在妻子雪芬突然去世之後，圍棋成為吳新榮或獨處、或與摯友相處時的最佳益友。

戰後政權轉換後，吳新榮再度燃起的政治熱情，卻因著國共內戰失去政權的國民政府在臺倒行逆施、地方派系的權鬥營私，讓他在戰後不到十年內，接連受到兩次政治冤獄。之後為了逃避政治而深居簡出的日子裡，與分散四方老友重聚下圍棋，竟也成為邁入初老且罹患高血壓的吳新榮享受生活的美好時光。此時膝下諸子一一長大成人，但回憶起小雅園，吳新榮與老友下圍棋的情景卻迄今難忘，碁盤檯並珍存迄今。

從戰時躲空襲到戰後避政治，其實都是時局作弄，實非吳新榮所願，當然亦非所有臺灣人所望；然而即使在如此艱困與苦難的環境中，圍棋看似偶然卻又「適時」地成為吳新榮從戰爭末期到戰後初期，面對不同外來統治時，與伙伴們在「歷經滄桑」之餘，定石布局且得以容身自處的道具。這些豈是當初向日人特務學下圍棋時，所能預見？

¹⁰⁰ 對鹽分地帶夥伴 12 人的總評。參見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2）：1938》，頁 266-267，1938 年 7 月 1 日。

引用書目

《臺南新報》

《臺灣日日新報》

〈五子棋〉，維基百科，下載日期：2014年9月9日，網址：<http://zh.wikipedia.org/zh-tw/五子棋>。

田村達太郎（編）

1935 《臺灣碁客銘鑑》。臺北：臺灣碁客銘鑑編輯會。

吳南星

2007 〈父親的種種〉，《臺灣文學評論》7(4): 13-19。

吳南圖

2007 〈《吳新榮日記全集》出版後記〉，《臺灣文學評論》7(4): 92-99。

2014 〈緬懷小雅園〉，收於封德屏總策畫、施懿琳編選，《吳新榮（1907-1967）》，頁103-110。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吳新榮

1989 《震瀛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

1981 《瑣琅山房隨筆》。臺北：遠景出版社。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

2007 《吳新榮日記全集（1）：1933-1937》。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7 《吳新榮日記全集（2）：1938》。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8 《吳新榮日記全集（3）：1939》。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8 《吳新榮日記全集（4）：1940》。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8 《吳新榮日記全集（5）：1941》。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8 《吳新榮日記全集（6）：1942》。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8 《吳新榮日記全集（7）：1943-1944》。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8 《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8 《吳新榮日記全集（9）：1948-1953》。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8 《吳新榮日記全集（10）：1955-1961》。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李敬訓

2011 《圍棋史話 1：從座子到御城棋》。臺北：鳴祝出版社。

2011 《圍棋史話 2：三三、星、天元》。臺北：鳴祝出版社。

2012 《圍棋史話 3：昭和棋聖吳清源》。臺北：鳴祝出版社。

東方孝義

1942 《臺灣習俗》。臺北：同人研究會。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主編）

2003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

2007 《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青楠散人

1940 〈鹽腦課園碁大會戰記〉，《臺灣の專賣》19(2): 57-60。

施懿琳

1999 《吳新榮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徐清吉

2001 〈追懷知友〉，收於吳新榮著、黃勁連編訂，《吳新榮選集3：震瀛回憶錄》，頁292-293。臺南：臺南縣政府文化局。

莊天賜（撰文）

2007 《二次大戰下的臺北大空襲》。臺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陳文松

2011 〈日治時期臺灣「雙語學歷菁英世代」及其政治實踐：以草屯洪姓一族為例〉，《臺灣史研究》18(4): 57-108。

2013 〈日記所見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打麻雀」：以吳新榮等人的經驗為中心〉，《成大歷史學報》45: 127-176。

2014 〈日治臺灣麻雀的流行、「流毒」及其對應〉，《臺灣史研究》21(1): 45-93。

2016 〈日治臺灣圍棋史初探：從東方孝義的觀察談起〉，收於林玉茹、植野弘子、陳恒安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IV：社會與生活》，頁241-267。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黃慧貞

2007 《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臺北：稻鄉出版社。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

1934 《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臺灣總督府（編）

1930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5年8月1日現在）》。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

1943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17年11月1日現在）》。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

增川宏一

1987 《碁》。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

蔡胡夢麟（別號古月山人）

1982 《岳帝廟前：臺南鄉土回憶》。臺北：自費出版。

蔣祖武（監修）

1972 《澎湖縣誌・卷14：人物志》。澎湖：澎湖縣文獻委員會。

興南新聞社（編）

1943 《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

Seeking Refuge from Air Raids and Politics: Go-playing of Wu Xinrong

Wen-sung Chen

ABSTRACT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between 1931 and 1945, board games like Mahjong and Go (碁) had different fates under Japan's "national policy." This paper explores three related issues: the popularity of Go among both Taiwanese and Japanese in Taiwan during the wartime years; factors that motivated a growing number of Taiwanese in that period to learn Go-playing from the Japanese; and the role of Go in the daily life of Taiwanese during the change of regime in the early postwar era. The exploration focuses on the personal experience/diaries of Wu Xinrong, a Taiwanese doctor whose favorite social entertainment between 1940 and 1948 was Go-playing.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from the analysis. First, Wu Xinrong started to learn Go-playing in 1940; and by playing the game with Japanese authorities in Taiwan, he tried to discern their mindsets regarding colonization. Second, Go-playing was the best pastime during blackouts and air raid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particular, after the sudden death of Wu's wife, this game became his means to escape loneliness and to interact with his close friends. Third, in the postwar years, Wu sought refuge from political disturbances by avoiding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while playing Go with his old friends became his most cherished enjoyment, particularly as he entered old age and experienced physical ailments.

Keywords: Air Raid, Go, Wu Xinrong, Blackout

